

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

(译文集)

冯利 覃光广 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

(译文集)

冯利 章光广 编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二十七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59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7441·12 定价：1.30元

编 者 的 话

当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的时候，文化问题明显地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近年来一系列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和各种各样的学术沙龙，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信息：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兴起于中华大地。

但是，迄今为止的文化研究，无论是总体上的理论探讨，抑或是具体的现象研究，都还处于初级的“呐喊”阶段。文化学研究的基础建设（理论方法与信息资料等等）显得十分薄弱，许多工作需要从头做起。千头万绪之中，我们以为，充分了解国外文化学研究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学术动态是至关重要的。

把文化作为近代科学研究的对象，首先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年)以他的《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名世以后，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现象的研究热情不仅经久不衰，而且愈来愈吸引了各学科的众多学者，他们共同把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地扩展开，出现了许多流派和理论，如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化论、文化功能论、文化结构论、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生态学，等等。

现代的苏联理论界，也对文化研究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一批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如《共产主义和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与

社会发展》等几十部专著的出版，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对上述国外文化学研究的成果，实行科学的“拿来主义”，是我们的一项当务之急。因此，我们不避愚陋，编辑了这本小册子，从国外文化学研究成果的长河中，觅一瓢以解小渴，并希望由此开一扇窗门，使读者窥见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化研究的某些侧面，以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研究的大厦。

本书选编的文章，部分选自国内的有关报刊，部分是我和有关同志直接从国外书刊译出。文章的内容和理论自有其作者的特点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相信读者当会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做一番扬弃工作。

编 者

一九八六年春

目 录

编者的话

文化与价值……………〔美〕E. 拉兹洛 (1)
文化一人一哲学:

- 关于整体化和发展问题……………〔苏〕《哲学问题》编辑部 (17)
文化与当今世界……………〔美〕斯普拉德利 麦克迪 (35)
文化人类学……………〔美〕D. G. 蒙德尔勃姆 (44)
文化人类学的课题和方法……………〔日〕石川荣吉 (60)
文化演化及其研究方法……………〔美〕E. A. 霍贝尔 (79)
当代进化论……………〔美〕D. 凯普兰 R. 曼纳斯 (92)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美〕J. H. 斯图尔德 (110)
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美〕R. McC. 内亨 (125)
社会和文化……………〔苏〕凯尔 科瓦尔森 (141)
文化与社会……………〔美〕罗杰·皮尔逊 (150)
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中的文化……………〔苏〕B. 凯列等 (167)
文化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苏〕H. 兹洛宾 (170)
历史进程中的文明与文化……………〔苏〕Л. 诺维科娃 (183)
论精神文化的价值……………〔苏〕E. 鲍戈柳 鲍娃 (197)
民族与文化……………〔苏〕B. N. 科兹洛夫 (208)
文化中的亚文化和反文化……………〔加拿大〕J. 鲍德里奇 (226)

文化 与 价 值

〔美〕E.拉兹洛*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我们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片断。在这片断的历史过程中，跟这段特殊时期以前一样，大规模的有机组织化过程一直在持续不断时快时慢地进行着，不断地发生分化、复杂化和联合；个人联合成群体，群体又联合成群体。但整个进程始终只发生过局部的倒退，并且时间不长。总的来说，与在有机界发生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也发生了不断出现分支的展开性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在文化框架以内发生的。文化既可能加快又可能减慢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当中有许多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因素。运用工具的能力就是一个这样的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因素发展成了强大的当代技术力量。还有更多的因素如社会风俗、调整人际关系的法律、商品交换以及人们进行交流的速

* E. 拉兹洛 (Lasslo, 1932—), 出生于匈牙利, 著名美国哲学家, 系统学学者。继 L. V. 贝塔朗菲之后在美国推动“系统运动”, 并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此文摘译自《用系统论观点看世界》, 相当于他的名著《系统哲学引论》简写本。关于他的系统哲学的全面述评, 见《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3期上译者的一篇文章。——译者注

度和范围等等。超出这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之上，有一套发挥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因素，正是它影响到任何一种特定的技术、法律和交流的持续存在、增长或衰败。这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套价值标准。归根结蒂，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由于文化同人类生物需要的满足无关，同人类再生产的需要也无关，由此可见文化满足的不是躯体的需要，而是价值标准的需要。价值标准决定文化实体内人们对理性、感情体验的深刻意义、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的需求。一切文化都同这种超生物的价值标准相应。可是，文化以什么形式做到这一点，则取决于人们具有哪种特定的价值标准。

在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起指导作用理想是过美好的生活。继之发挥作用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上帝的天国接替美好的生活成为下一个指导思想。这种情况一直没发生变化。直到近代，事物的外部秩序重新成为精神和理性寻幽探微的对象，人才开始采用新的价值标准。最初他是在做“总和是零的博弈”（Zero-sum games）；他进行这种博弈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商品的数量就那么多，要尽可能平均地分配。一个人赢得的，就是另一个人失去的。不过，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商品生产中采用了转换能量的新技术，“总和是零的博弈”被“增长博弈”取代了。正如亚当·斯密明确说出的那样，早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可以形成一个增长的循环圈，一个环节的增长不断导致另一个环节的增长，等到这个循环圈回到它出发的起点，整个一圈各个环节都赢得了增长。象储存、投资、生产、分配、消费、劳动和再储存，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圈。人们认

为，这些循环圈只适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他们认为，当每个人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东西，精神财富紧跟着就产生出来了。

近代资本主义把牛顿科学应用于生产技术，使经济生产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价值标准转向了物质主义：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高就是美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更高就更美好。但是，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内部问题，促使许多思想家建立替代的理论。马克思提出了最激进的一种，断言有必要取消私有财产、分工和阶级差别。另外一些人（如凯恩斯）建议，要创造出一种经济，有充足的商品满足每个人挣钱的能力。后者的理想仍然集中注意物质商品，把物质商品作为人的满足的先决条件，而不管这些商品是通过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财团资本主义来获取，还是通过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获取。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黄金时代就会到来，那就意味着更多地生产和更平均地分配商品。

在此期间，西方文化取得了降低死亡率的成就，但没有立即降低出生率，又增加了人际间的交往，并按西方文化的图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这又促成巨大数量的人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内，人们一直认为天空是他们发展的限度，而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地球是限度。地球只有这么大，地球上可用来实现人的目的的东西就这么多。不仅无限地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世界其余地区都达到美国和西欧现已达到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过西方人现在过的生活。地球上的资源不足以做到这一

点。对那些做“总和不是零的博弈”的人来说，这是某种全新的情况。我们已经开始领悟到，并不是更多和更大就是进步。必须对进步做出新的定义，而那就意味着新的价值标准体系。可是，现在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价值标准的基础呢？目前，这成了我们的首要问题。

不久以前，社会上流行用彻底的怀疑论来对待价值规范，认为它们充其量不过表达出了个人的喜好和厌恶。它们被说成是个人方面的感情反应，是不能做出客观证明和反驳的，就象我们不能证明或反驳一个人对高山或海滨的偏爱一样。文化人类学中的相对主义，加上哲学伦理学中的主观主义和非认知主义，宣判了规范价值标准的死刑；学者们发现无法为它们辩护，从而认为，甚至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人们持这种怀疑论态度，部分原因在于了解到人们信奉的价值标准很不一样；部分原因在于对价值标准本身似乎也还没有任何可靠的经验体验。公共广告常常宣称，人可以看到这种或那种产品的价值；与此相反，人既不可能看到价值标准，也不可能听到、摸到、尝到或闻到它们。因此，除了个人的偏爱之外，似乎不可能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价值判断是合理的。尽管偏爱可能就是很好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你喜好这种事情，我喜好那种事情。可是我们根本不可能证明大家会一致同意什么是最好的事情。

然而，对价值规范的客观性过早抱怀疑论态度，可能是太欠考虑了。我们缺乏对许多价值判断的客观基础的认识，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甚至可能是这样：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忽视了客观基础。但这并不排除存在着可以被发现的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因而我们有可能作出有认识基

础的客观价值判断。

我们可以从当代科学对自然的系统的认识中直接推断出客观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是人的行为努力奋斗所要实现的目标。任何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都是受价值定向的活动。凡追求目的无不受价值约束。即使是科学，虽然人们常引证说它是人的客观性的范式，但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科学也是受价值定向的。这不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追求真理，而且还指特定意义上的追求某种挑选出来的掌握真理的方式。在文化领域内，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人脱离价值标准的范围——因为没有什么事实在你周围漂浮，无须你评判和期待，只要一伸手就抓得到。

更为重要的是，从系统论本身这个制高点来看，在整个自然的系统的范围内，没有什么是不受价值约束的。自然的系统全都尽可能地损耗这个物质宇宙，向内部聚积秩序和可以利用的能量，把无秩序和熵留归它们的环境。在环境走向衰败的同时，这些系统自己却保持稳定状态，甚至还能增长和增加它们自己的组织性。如果你正巧是一个这样的系统（我们全都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非常确定的目标。你必须维持自身的运转，抗拒一切事物都有的那种物理衰败的不利形势。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完成必要的维修，包括最终实行根本性的维修——用你自身的一个特殊部分把你自己再生产出来，用新的系统整个地替换你自己。这些是所有自然的系统共同的价值标准，次有机组织系统、有机组织系统和超有机组织系统也都以某种不同形式同样地遵循它。没有哪个系统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拒绝这些价值标准而不受其约束。因为任何改换或相反的做法，都很可能造成自己有机

组织性的降低和瓦解。

然而，这些价值标准怎样表现出来，则取决于每个系统属于哪个等级层次，有什么特点。可见，尽管所有自然的系统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但这些价值标准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则是一个层次跟另一个层次、一个物种跟另一个物种各不相同的。因此，如果一个生态系统内物种成员已达到了高度的多样化，考虑到神经的功能和相应行为的高度变异性，那么，在这个物种自身的全体成员内部，价值标准的表现形式进一步的规定就会出现。就人类来说，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鲜明。我们确实具有所有自然的系统的价值基础，可是我们明确规定使它适合于人这个层次。同时，我们确实具有所有人共同具有的价值的主要成分，可是我们明确规定，使它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目的。在这方面有相对性，但并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相对性；它可以同客观的自然标准相比较。

当代文化人类学家们，正在详细规定一张基本的、普遍的、世界各地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清单。尽管其表现方式往往十分不同，但所有文化实体都表现出同样的基本价值标准，即生存、相互合作、养育儿童、崇拜超越世界的实体、避免苦难、避免非正义和痛苦的价值标准。表面的形式不同，而深层结构是异质同型的。人类分散居住在各处，但作为一种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物，人类追求相同的目的。

我们全面考虑一下这些发现显示出来的结论，我们就会明白，人类的这些客观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它和所有自然的系统共同遵循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生存、

进行创造，并在由他的同胞组成的社会中互相适应；至死方休，别无选择。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被强制去履行这些价值标准在文化方面的具体规范。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领悟去选择。但我们当然必须（在跟上面相同的意义上）保持在自然的系统的普遍性价值标准的限度以内。发现并尊重这些限度，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认为跟灵魂安宁相一致的德行就等于美好，这是古时候基本自然价值标准的规范。认为美好等于生产——什么都生产得更多，生产规模更大，就更美好，这是当代的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富裕是美好，或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富裕才是美好，这两种观点是当代价值标准进一步的分化。同物质主义价值标准完全不同的，是西方和东方宗教所主张的价值标准：救世、慈悲和纯洁，正大光明，灵魂超脱（涅槃）和禁欲主义。但总的来说，当代历史是由在物质主义价值标准规范上产生的竞争造成的。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哪种生产方式真正是好的生产方式，而不在于生产是否规定和表现出人美好的天性。确实，饿着肚皮去追求高尚的理想是不大容易的。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当肚皮吃饱了，人就去追求高尚的理想。所以，尽管吃饱肚皮是必要的，但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我们切不可满足于指责现有价值标准的错误，我们还有必要指出新的更好的价值标准。尽管这么做本身必然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不过我们必得这么做。如果这新的价值标准是能存在下去的，甚至最保守的人也会慢慢地接受它。

我们正在探询人类必要的价值标准。让我们仔细地区分描述性的价值标准和规范性的价值标准。人类当然具有价值

标准——一个完整的价值标准等级结构。当我们描述它们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描述性的价值标准的体系。我们有充分把握认为，除这些价值标准以外，人类并没有另外的规范性价值标准。规范性价值标准（或价值规范），是我们通过考察人类的特点，通过指出那些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价值标准而发现的东西。因而规范性的价值标准不是被描述的，而是被提出的；它们是追寻底蕴的理智的创造。

这并不是说，规范性的价值标准是任意确定的。作为以各种方式和各种近似的价值标准表达出来的规范，它们存在于实际的价值评价领域。装在暖气系统上的普通恒温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调整控制器对准68度，这台装置又是在正常地发挥功能，那么房间的实际温度将围绕68度上下波动。实际温度的高低，就如同我们通过描述所知道的一个文化实体的价值标准；相应地，调整恒温器对准的温度，就是那个文化实体的规范性的价值标准。实际价值标准并不固定在规范上，它们围绕着规范上下波动。并不是说，在所有描述性的价值标准当中，存在一种另外独立的规范性价值标准，恰如在这间由恒温器装置调节的房子中，也不存在另外一个独立的温度。存在的只是实际的估价值，或者是通过描述得知的，或者是通过内省得知的。但是，它们都受到内在规范的调节，通过耐心细致的探索，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规范。

什么是人类内在的价值规范呢？古希腊人做出过回答，他们说美好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具体地指出，幸福就是我们身上各种特定的人性得以实现。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理性是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基本要素，理性的实现使人幸福。——对希腊文明理性主义的崇高精神来说，这种

回答是典型的。即使没有这后一方面特殊的明确解释，我们也可以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正如当代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们和心理学家们所承认的那样，自我实现是人类有意识行为的目的。所谓自我实现，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固有的潜能现实中发挥出来。如果我们到现实中去上下求索，就会发现，自我实现是可能存在的内在价值规范的形式。个人的实现可能是一个人的价值。这可以用系统论的观点来具体说明和分析。

正象古希腊人一贯认为的那样，个人的实现，不是指个人心灵的某一种才能或精神的某一部分得到发展。它是指数目不定的不同潜能和不同潜能的组合，按照个人气质和自觉的愿望，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同一件事，对一个人是实现，对另一个人就可能是约束；人与人差别之大足以使一个人的美食成了另一个人的毒药。但是，我们大家并不是完全不相同的，因而我们可以谈论人类潜能的综合体，个别人从这个综合体中选择自己实现的途径。实现的意思是，作为一个生物的和文化的存在物，人所具备的潜能发挥出来了。它既指身体健康，又指精神健康。实现意味着适应环境；人作为生物机体，他身体等级结构的各部分构成了一个不能解降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人要适应环境；人作为社会文化角色的承担者，协力合作构成了给定的社会中由许多人组成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人也要适应环境。实现还意味着作用于环境，既要作用于生物机体的内环境，又要作用于社会的外环境，并且还要把环境创造得适合于人发挥他的潜能。实现要有一个整合和调节的能动过程，从而创造出人的所有潜能得以发挥的条件。

个人的实现是受具体因素决定的具体过程。实现的过程发生在这个人具体处境的框架结构中。由于一个人所处现实状况的条件综合体是被限定的，因而这后一个过程同样是被限定的。但是，要用一般理论的形式具体列举出适用于每一种处境的规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一困难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在应用这种理论时，要适当考虑个人处境的具体情况。但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清二十世纪后期限定人的处境的那些条件总的类型，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把一般性理论应用于特定情况。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用系统论观点考察一下决定当代人处境的有普遍性的因素。

在地球自然界这个具有有机组织复杂性的世界上，时间之矢并没规定个别系统沿什么途径前进，只规定这些个别系统前进的路径朝什么方向汇集。自然界有机组织结构这个总的不可逆过程，包括现有系统逐步的分化，包括在一直保持个体性的巨大统一体中不失其整体性而融合于其中的较小的系统，还包括在同一等级结构层次的系统之间交流水平的提高。这个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输入这个巨大超级系统（即世界各国组成的全球社会生态）的信息的水平提高了。用现代信息论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大量的“噪声”进行性地衰减，并被“信号”取代。这巨大系统本身改变了，机遇的作用越来越小，规律和类似法律性的东西所起作用越来越大。总之，随机性减少，决定性增加了。

有很好的经验证据可以证明，在社会文化领域内当代的发展型式确是这样的。相对孤立和简单的团体结合成更大的、更复杂的团体，同时结合成的统一体的交流水平也提高了。这些更大的系统又投入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共同构成

更高层次的超级系统。现在，我们已接近这个进程广阔的外部边界，即国际交流和全球系统的形成。更进一步的发展不大可能再向外部扩展，因而会转向内部集约。在数目有限的国家系统和多国系统之间交流增长了，这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相互决定性的增强。按照噪音通过更宽幅的有效国际交流信道衰减成信号的比率，世界越来越变得象一个单一的单位。一个村庄是一个单位，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其余的每一个人，互相经常磕头碰脑。当类似的条件具备的时候，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村庄”。在那么大规模的村庄里，能认识其余每一个人的当然不可能是一般人，而是国家元首和在行使职权的公司头头。个人将被越来越深地嵌入复杂的等级结构中。个人和他们主要的团体共同构成许多社会文化单位；个人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这许多社会文化单位的相互作用间接地发生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对个人来说是可悲的。因为，决定性被引进到支配个人的那些系统到了如此程度，那么个人也就成了一台固定机器上的齿轮。越是严密地组织起来，你就越被严格地管制起来。创造一个全面组织起来的社会，就是创造一个象被全面管制起来的齿轮那样的肉体组成的机器。

不，情况不会是这样，——这是对个人处境所作的一种虚妄的估计。尽管常常有人（最近是斯金纳）说到这种情况，但那是个严重的错误：他把人的群体和社会想象成基本上是机械的系统了。然而，按系统论观点看，人的群体和社会都是动态系统，而不是机械系统；它们的确定性不是由它们各部分之间个人相互作用的决定性造成的，而是由它们各部分之间个人统计性的相互关系造成的。在一台相对比较简单